

新校



竹简本孙子释义

王正向、著

新校竹简本孙子释义

王正向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校竹简本孙子释义/王正向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80237 - 466 - 9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
②孙子兵法—注释 IV. ①E89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260 号

书 名: 新校竹简本孙子释义

作 者: 王正向

责任编辑: 王显臣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466 - 9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河北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王正向

1942年8月出生於陝西省周至縣。空軍某部高級工程師。1967年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航空無線電工程系，後在空軍某基地長期從事國防科研工作。本書作者在武器系統試驗及應用數學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統計學中著名的學生t-分布公式的簡明完美形式就是由他給出的，並先後在有關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王正向先生所撰《〈孫子十三篇〉竹簡本校理》一書，恢復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孫子兵法》的可讀性或原貌，受到業內名家的贊許。本書進一步闡發了前書獲得的理論成果，還原了兵聖軍事思想精蘊，有益於人們深入理解和利用孫子的軍事思想和兵學體系。

汉简本孙子《十三篇》的发现和整理出版，无疑是对传本《孙子》的一个重大挑战。

虽然正如汉简本编者所指出的那样，“简本文字有不少胜于今本之处”，但银雀山汉墓竹书整理出版之后新出的《孙子》校释之作虽多，而所利用的汉简本材料却十分有限，致使传本中的许多严重谬误在这些新校本中依然如故地存在着。

责任编辑/王显臣

封面设计/倪春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孫子兵法》木牘



執

實軍行

九十五

九地
用間
火執
七千

刑

图一：汉简本篇题木牘

銀雀山漢墓竹簡(意)

而說之攻云

備出云

勝不可

善勝者

弄少

元算

此觀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

乘帶甲

里而饋量則外內

車甲之奉日

用戰勝久則頓

起雖知者不能善

其後矣故

未有也故不盡於知用兵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图二：《作战》竹简选登

序 言

据《史记》所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接着就记叙了孙子在吴宫训练女兵而斩吴王爱姬的故事。赵晔《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明确指出此次献书的时间，是在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同年，阖庐亲率吴军攻克了楚城舒邑，之后又想顺势攻打楚国都城郢，《史记·吴太伯世家》有记载云：“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吴王阖庐听从了孙子的劝谏，把这场战争推迟到阖庐九年（公元前506年）时机成熟时方始进行。这证明孙武在献书、练女兵、斩美姬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吴国的“将军”，并作为阖庐的得力助手而参与高层谋划及作战指挥。《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此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史记》叙事多用互见法，不同篇章所记内容互相补充，可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云“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之语当属事实，包括孙子《十三篇》的成书时间在内，不能以后世疑古派之所谓“类似小说家言”来看待；至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否定《史记》所载内容的确凿证据。

孙子《十三篇》一书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期间世，至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形成了《韩非子·五蠹》所说的“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局面；司马迁作《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时，仍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

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可知战国秦汉之际社会上的孙子《十三篇》抄本非常多，经过西汉一代的三次收集，所获孙子《十三篇》抄本及其附益之作当为数不少，这是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的基础。从任宏校订《吴孙子兵法》起，到曹操单注其中的《孙子十三篇》而作《孙子略解》止，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架构及文字就被基本定型。一则由于受到直至西汉末期近五百年的流传演变的影响，再则由于受到汉代第三次兵书整理者步兵校尉任宏本人的文字水准及逻辑思维能力欠佳之限制，使得《孙子》一书的文本面貌在基本定型之后较之定型之前，发生了剧烈改变。以深埋地下两千余年之后再现人间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衡之，当知传本《孙子》或者就是世界上文字错误最多的军事教科书。《〈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的校勘结果表明：包括篇名、篇次的不同在内，《孙子》传世本与汉简本的文字差别不少于390余处，其中干系重大、导致文法不通与情理或逻辑不通之处为数不少，且其错误性质之严重亦甚触目惊心。面对传本《孙子》，古今诸多钟情于《孙子》的方家都不免感慨连连。曹操《孙子略解·序》云：“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张文穆《孙子解故·述例》云：“《孙子》十三篇明白易晓，初无难解之处。只因历时日久，传抄转印，以致误衍、窜夺，几难通读。”杨炳安《孙子会笺·后记》云：“曩读《孙子》，尝觉其文字鲁鱼亥豕，歧异殊多。”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在目前具备的条件下，《〈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尽可能地恢复了汉简本的可读性，并力图使其接近汉简本原貌。本书是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前书的姊妹篇，

目的在于把这个研究成果介绍给普通读者：以便更多读者了解传世本《孙子》在文字义理及思想内容方面，与其在秦汉之际未经任宏校订时的固有面貌有何不同；了解《孙子》一书在其问世后 2500 余年流传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演变情况。这或者有益于人们对于《孙子》一书本旨的正确理解，从而更好地掌握和利用孙子的兵学体系和军事思想。

有比较方有鉴别。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一书出版之际，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以下简称“编者”）在该书《编辑说明》中明确指出，汉简本孙子《十三篇》与传世本《孙子》的重要差别有二：一是“据篇题木牋，简本十三篇篇次与今本有出入”；二是“简本文字有不少胜于今本之处，在《孙子》的校勘上有很大价值”。这两条结论，是编者在汉简本已存文字与传世本《孙子》进行认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全面深刻地概括了孙子《十三篇》汉墓竹简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两条结论的得出，同汉简本《孙子》本身的出土面世一样震撼，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这是自曹操《孙子略解》问世以来约 1800 年《孙子》研究史上的重大转机，海内外学者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孙子》简本与传本比较研究的漫长历程，新的校勘论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对汉简本残缺文字进行认真考证并试图恢复其可读性的诸多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诸多成果之中，以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孙子〉古本研究》一书为成果最丰，贡献最大。该书从对《孙子》校勘方法的研究及对校勘所需材料的收集整理两个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孙子〉古本研究》指出：“古代类书以及其他书籍的引文虽经节引、改易、增删，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书的真实面目”。基于此种认识，该书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散见于汉唐时期经传史籍中的《孙子》引文做同

时期和前后期的序列排队，藉以理清宋版书定型以前的发展线索。”诸多散见于众多古书中的材料第一次被集中在一起，完整而有序，非常便于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时利用。《〈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之所以能在大漠戈壁深处基本完成，得益于《〈孙子〉古本研究》之力者甚大。

关于《孙子》十三篇的篇次，以汉简本篇题木牋为基础的校理的结果表明，十三篇之中有八篇的位次被汉代刘向、任宏颠倒或大幅度调换，而以“篇以类聚”的编排思想为指导，则是导致传本《孙子》篇次大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传本以《势篇》与《虚实篇》前后相次，是因为这两篇内容均涉及“众寡”与“虚实”两组概念所致；而《行军篇》之下移在《九变篇》之下，与《地形篇》、《九地篇》并列，盖因此四篇所言多涉地形之故，亦可用此种“篇以类聚”的编排思想来解释。而为了实现《势篇》与《虚实篇》以类相聚的目的，汉代校订兵书的任宏除了大幅度调换《作战篇》、《行军篇》的位次之外，又将篇题木牋的《势》、《形》相次和《军争》、《实虚》相次，分别颠倒为传本的《形篇》、《势篇》相次与《虚实篇》、《军争篇》相次。此外，木牋最后两篇本以《用间》、《火攻》相次，亦被任宏颠倒了位次。传本篇目次序的剧烈变化，人为割断了《孙子》各篇的内在逻辑关系。

对于传本《孙子》的篇目次序，古今注家多有评论其合理性的解说，但汉简本篇题木牋的面世，使得这些解说大多被颠覆，使之变成曲为之辩的牵强附会之说。例如，《计》篇用以知胜，然而获取胜利需要付出代价，因而“如何降低获胜成本、并使胜利果实最大化”的问题，就是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战略课题。孙子认为以“谋”攻人可使“兵不钝而利可全”，从而大大降低获胜成本，而据篇中“故上兵伐谋，其次

伐交，其下攻城”所言，可知“谋攻”应施行于两军交战之先，且大谋略之设定须以庙算为基础而完成于庙堂，故当以木牒的以《谋攻》次《计》而位居第二为是；又《谋攻》篇篇末所述五条“知胜之道”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论，是对《计》篇内容的重要补充和概括，这表明《计》与《谋攻》两篇关系密切，不宜分隔。但传本却以《作战篇》插入《计》与《谋攻》两篇之间，从而隔断了《计》与《谋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作战》篇之从汉简本的序次第五，一跃而变为传本的序次第二，系汉代人以兵权谋家“先计而后战”为由而臆改，但其所据理由不足为凭：当此攻人之“谋”未定未施、以佐其外之“势”未造及“先胜”之形未成之际，即轻言《作战》，实与“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无异，而与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及“胜兵先胜而后战”之旨不合；再则《计》、《谋攻》、《势》、《形》四篇系言战略权谋，而《作战》篇则把目光伸入到战争全过程，甚至触及战争结束之后的政治格局，此下八篇则转而论述战术，故《作战》篇实系战略论与战术论之转换关节，因而当以其次《形》而位居第五；又，《作战》篇既是战略论与战术论之转换关节，而《行军》篇所言“处军、相敌”二事又是战术行动之开端，据此亦应以《作战》处于《行军》之前而位居第五。传本《作战篇》位次的大幅度变动，严重地破坏了上述种种内在逻辑关系。

篇题木牒所列《作战》、《行军》、《军争》、《实虚》、《九变》五篇，环环相扣，逻辑关系密切：《作战》篇是从战略论到战术论的转换关节，《行军》篇则承接以作为战术行动开端的“处军、相敌”之论；来自《行军》篇“处军、相敌”二事所成的兵力部署态势及所获战场情报，又是军队争取战役、战术利益之基础，故木牒以《军争》承接《行军》。然而因

《行军》篇所言多涉地形，传本遂以“篇以类聚”为由，将《行军》篇大幅度下调至《九变》之下，这就割断了《作战》、《行军》、《军争》三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木牍的《军争》、《实虚》相次之被传本颠倒，不仅与孙子“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论断相悖，而且还使得《军争》、《九变》两篇之间的篇章划分也成了问题，以致“错简”之说在元明两代盛行。又篇题木牍以《用间》、《火攻》相次，而传本则互易作《火攻》、《用间》相次，或以为此种变化无关紧要，其实不然。孙武主张用兵当如“恒山之蛇”那样，要能“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其于“十三篇”之行文谋篇，也是以这样的要求为标准：《计》为首篇，开头即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言重战；《火攻》为末篇，结尾则云“怒可复喜也，愠可复悦也；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以言慎战；《十三篇》以“重战”始、以“慎战”终，且其“重战”、“慎战”之旨贯穿于中间各篇，于是全书“譬如率然”之势成矣。传本以《用间》作为结尾，破坏了全书的首尾相顾之势。总而言之，编排思想的多元化倾向及编排方式的剧烈变化，割断了《孙子》全书各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使孙子兵学体系的架构遭致严重破坏。

关于《孙子》的文字义理，对于汉简本残缺文字的全面校理结果表明：简本字数为5748字，与高诱之所谓“《兵法》五千言是也”基本相合；衍夺相抵之外，曹注本多出219字，十一家本则多出259字，而传本与此相关联的衍、夺、倒、讹之误多达390余处，其中单是字词互易、语句颠倒之误就多达50余处。尤其是与字词互易及因传写而误入正文的十余条读者旁记之辞相关联，传本《孙子》中存在着涉及面相当广泛

的系统性文字改动，其数不少于 30 余处。这些系统性改动，手段多样，对于文义的伤害程度不一：有的破坏句读，导致严重的情理不通或逻辑不通；有的则歪曲孙子的重要军事思想，情形严重者甚至伤及相关篇目的整体内容。兹举数例如下，以见一斑。

例一，在“我寡而敌众”的战略形势下，敢于并且善于“以寡胜众”，是孙子的重要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作为兵家鼻祖，孙子不但有“以寡胜众”的实际战绩，而且还有“能以寡击众”的理论和主张。《尉繚子·制谈》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武子也”，西破强楚、五战而入郢者仅以三万之众，是其“以寡胜众”之赫赫战绩；而《实虚》篇简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所言，则是其理论。作为独立整句，该句因果关系明确，所言战术带有明显的运动战色彩：作战的时间与地点既令敌皆“不可知”，势将逼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如此则敌人能参与战斗的兵力必定“寡矣”。但传本却通过字词互易、辞语增删等手法，将简本此句改作“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模样，遂将简文的一个完整的因果复句分为三截，并使之分属三句：于上则以“则我众而敌寡”与上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连读为一句；于中则以“能以众击寡者”与其下衍文“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连读为一句，而所衍之文又与传本下文“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句之语义犯复；于下则删削“与战之日”四字，仅以“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与下文“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连读为一句。任宏对于《孙子》此处文字的系统性改动，使得传本此处的句读及文义为之大变，导致孙子“能以寡击众”的思想或理论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遂使孙子的这一重要思想之不传于世，迄

今已历两千余年之久矣。

例二，《军争》篇简文“军争之难者，以益为直，以患【为迂】”，传本改作“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其“迂”、“利”二字实系简文“益”、“迂”二字之互易，且又改“益”作“利”。简文“以益为直，以患【为迂】”二句，以“益”与“患”互文、“直”与“迂”互文，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为义深长：“直”者，近也，“以益为直”以言近利；“迂”者，远也，“以患【为迂】”以言远患。简文整句意谓“军争的困难之处，盖在于如何近利远患”，因而本篇下文作为重点论述的“迂直之计”或“迂直之道”，本质上也就是“远患近利之道”。但传本的臆改之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却割断了“迂、直”二字与“患、利”二字的联系，这导致后世注家认为军争之难“在于把弯路当作直路，把患害当作有利”；而与此相关，后世注家还把孙子的“迂直之计”或“迂直之道”看作是单纯的“弯路和直路两者的关系”。通观《军争》全篇，孙子于篇中并未给出缩地穿隧之术来解决“将迂回道路变成直达的道路”的困难，有以知传本“以迂为直”之所言，实不能与简文“以益为直”所表达的“近利”思想相提并论；而包括论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先知迂直之道者胜，此军争之法也”一段文字在内，《军争》全篇以至《孙子》全书，并无一字论及如何“把患害当作有利”的方法，有以知传本“以患为利”之所言，实不能与简文“以患为迂”所表达的“远患”思想相提并论。传本“迂、直”二字与“患、利”二字之间联系的割裂，导致了人们对于孙子“迂直之计”或“迂直之道”的片面化理解，实与《军争》全篇的主旨相去甚远，足见其文错误之甚、为害之大了。

例三，《作战》篇简文“近市者贵〔卖公家竭〕，则

〔必〕及丘役”，说的是因大规模战争而导致市场物价上涨、公家财政枯竭，以致必须加征丘井之军赋，是“国之贫于师者”的原因之一。但传本却改此句作“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说的是“百姓”自己因财竭而“急于丘役”，此论既有悖于情理，又不合逻辑：难道“百姓”会有此种意愿和权力吗？即使有此特权，其征敛对象又是谁？春秋时代处于奴隶社会，“百姓”系指奴隶主贵族，丘井内之土地、物产及奴隶，均系“百姓”之财产。“百姓”既然是丘井财产的所有者，理应也是纳税者或丘役之承担者；而丘役之征敛权则属于“公家”，其征敛对象只能是“百姓”，但传本此句却谓“百姓”即纳税者自己“急于丘役”，实在是匪夷所思。至于传本“近师者贵卖”句之所言，盖谓物价上涨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仅仅存在于军队驻地附近，此义与该篇上下文所言之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全局性灾难不合。凡是大肆兴兵久战之国，必然导致全局性市场物价上涨，古今中外各国均难例外。该篇上文云：“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下文又云：“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六；公家之费，……十去其七。”两段文字所言均系全局性灾难或创伤，由此导致的物价上涨现象也必然是全局性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军队驻地附近，更何况春秋时“出征千里”的大军之驻地大多不在本国境内。传本臆改之文所导致的情理不通与逻辑不通，极大地伤害了《作战》篇全篇的思想内容。

例四，《形》篇一开头即以“不可胜”与“可胜”进行一系列排比性论述，并以术语转换的方式给出结论说“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其意全在于强调我之“不可被战胜”的重要性，即强调战略防御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仲秋纪·决

胜》有云：“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此论可谓深得《形》篇精要。但传本却通过词语互易，将孙子的这一重要结论改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致使二者文义别如天壤。又简文之“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句，生动地概括了积极防御不可或缺的“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其中的“藏九地之下”，说的是“战略退却”；而“动九天之上”，则说的是“战略反攻”；兼擅此二术者，方能完成积极防御的任务而实现“自保全”之目标，方可称作“善守者”。故简文此句之所言，就是对上文的进一步引申，强调了积极防御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意义，根本无涉“战略进攻”之事。但传本却将此句改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这里的系统性改动，一则使前文有“善守者”与“善攻者”两个主语，则不知下文“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句之“自”当何指？一个“自”字，实难二者兼指，从而导致了形式逻辑上的严重矛盾；再则更为重要的是还使句读及语义发生重大变化，其文不仅以“善攻者”与“善守者”并言而不分轻重，而且又以“自保”与“全胜”相提并论，从而导致后人误以为《形》篇主旨在于并言攻、守二义而不分轻重，严重地误导了人们对于《形》篇本旨的正确理解。

例五，诸多因传写而误入正文的读者旁记之辞的存在，导致传本《孙子》句读及文字义理遭致破坏的现象颇为严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明了传本文字的芜杂。例如《九地》篇简文“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发其机，若驱群羊”，本是一个典型的先秦散对句式，其中的“若驱群羊”与“如登高而去其梯”相对成文，全句对仗关系鲜明而语义完整。但传本却以“若驱群羊”与其下窜入的读者旁记之辞连读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